

21 世纪初期



日本的 东亚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1 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012-3944-3

I. ①2… II. ①中… III. ①日本—对外政策—研究—东亚 IV. ①D8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6892 号

- | | |
|------|--|
| 书 名 | 21 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
21 Shiji Chuqi Riben de Dongya Zhengce |
| 作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 |
| 责任编辑 | 张迎辉 |
| 特约编辑 | 林 昶 |
| 责任出版 | 刘 喆 |
| 封面设计 | 林 昶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
| 电 话 |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世界知识书店) |
| 印 刷 | 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开本印张 | 787×1092 毫米 1/16 23½ 印张 |
| 字 数 | 450 千字 |
| 版次印次 |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201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12-3944-3 |
| 定 价 | 48.00 元 |

序

在中国的日本研究领域，日本外交政策，尤其是东亚政策历来深受关注，更是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极具现实性的重要课题之一。2006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成立了“21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课题组，开始探索未来15年日本对东亚的政策走势。该项目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课题组成员戮力同心，反复细致地挖掘资料，深入分析和潜心研究，四载寒暑终于如期完成撰写任务，并以初审、复核的优秀等级顺利结项。

新世纪对于日本而言，是一个充满新的机遇和挑战、挑战大于机遇的时期。作为二战后国际体制的受益者，在上世纪60年代即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正陷于一个转型的困惑期。日本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作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研究成果，《21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一书的目的即是对21世纪初期日本东亚政策的内容、调整趋势和调整内涵进行深入探讨和全面阐释，重点放在从宏观和微观对日本东亚政策的全面把握上，从中探讨我国对日政策的总体思路。

本书致力于揭示如下循序渐进的四个环节：第一，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总体构想；第二，日本东亚政策在其总体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第三，日本东亚政策的基本结构；第四，日本东亚政策的具体内涵。

作者们循着这个思路完成了课题的谋篇布局：绪论对全书起到提纲挈领的概括性作用，总结了本书的整体写作思路与方法；第一章从国际秩序、外交决策及国家战略的视角探讨和揭示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前提；第三章到第六章对冷战时期、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初期日本的对美政策、对华政策、对东盟政策、对朝鲜半岛政策及对俄政策进行系统探讨及展望；第七章在指出日本东亚政策的基本思路基础上，对日本的地区安全政策调整趋势、地区合作政策的演变及趋势和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等进行前瞻性探讨；根据课题结项时评委及主管部门的建议，增加日本政权更迭后的东亚政策这一部分作为终章。

在具体分工上，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的集体作品，课题按照大家的学术专长分配了各章节的执笔人：绪论、第一章由今昔、张勇撰写，第二章由刘世龙、吴怀中撰写，第三章由今昔、吴万虹撰写，第四章由白如纯撰写，第五章由丁英顺撰写，第六章由今昔、吕耀东撰写，第七章由今昔、吴怀中、白如纯、庞中鹏和王广涛撰写，终章由吕耀东撰写。

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追踪分析现实问题和探索其中的理论问题，既是理应很好兼顾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一项不易做到的课题。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相信这是每个国际问题研究者都在追求的一种境界。本课题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及科研局、日本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2009 年，课题组在来自各方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切实履行了申请课题时对院所两级的郑重承诺。本书的撰写者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作为研究日本外交的“劳绩”自不待言，但在笔者看来，本书堪称该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成果，在启迪人们思索日本今后在世界上的定位与趋向方面，颇具开创性工作的“功德”。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新书付梓，本书的撰写者欣喜之余又一再表示“自己的研究尚处在提出问题、初步研究分析的奠基阶段。今后将在把握日本最新学术资料和动态，以及与日本各界核心人物的交流和搜集日本最新资料方面，花大力气、下足工夫”。这种不断进取的态度也值得肯定和赞誉。

日本外交至今仍在经历着结构性调整期的摩擦与震荡。可以预见的是，伴同日本外交进程的嬗变，中日关系也将得到新的战略调整。最近一个时期中日在钓鱼岛周边偶发的撞船事件，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是中日旧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后难以避免的冲突和摩擦。究其本质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引起日本的不适应；二是日本政治与外交战略自身发生了某种质变；三是美国面对日本民主党第一届政府“疏离美国”的外交战略调整，也“需要”中日乃至东亚出现“适度”的紧张局势。如果从日本外交着眼，民主党的市民型鹰派领袖们今天似乎急于在中国更加强大之前强行突破中日关系原有框架，实现其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继续研究并回答新形势下的日本外交动态，恐怕恰恰是笔者和广大读者今后对本书的各位作者寄予的关注和期待。

高 洪

2010 年 10 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21 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前提	(7)
第一节 东亚国际秩序的轨迹与前景	(7)
第二节 21 世纪初期日本外交决策的基本特点	(15)
第三节 日本国家战略论争与各派政策主张	(42)
第二章 东亚政策的基轴——对美政策	(62)
第一节 冷战时期日本对美政策	(62)
第二节 冷战后日本对美政策	(91)
第三节 21 世纪初期日本对美政策及展望	(103)
第三章 合作与竞争的重点——对华政策	(131)
第一节 战后日本对华政策	(131)
第二节 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对台政策之演变	(170)
第三节 21 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及展望	(189)
第四章 重点争取对象——对东盟政策	(197)
第一节 冷战时期日本对东盟政策的演变	(197)
第二节 冷战后日本对东盟政策的新调整	(202)
第三节 21 世纪初期日本对东盟政策展望	(213)
第五章 争取与打压——对韩、朝政策	(221)
第一节 冷战时期日本对韩、朝政策的定位	(221)
第二节 冷战后日本对韩、朝政策新特点	(229)
第三节 21 世纪初期日韩、日朝关系及其展望	(236)

第六章 经济与领土——日本对俄政策	(247)
第一节 战后日本对苏政策及演变	(247)
第二节 冷战后日本对俄政策新特点	(252)
第三节 21 世纪初日俄关系及政策展望	(257)
第七章 21 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及走向	(275)
第一节 日本东亚政策的基本思路	(275)
第二节 日本地区安全政策调整趋势	(292)
第三节 地区合作政策的演变及趋势	(310)
第四节 日本对东亚地区的能源政策	(320)
第五节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及实践	(332)
终 章 日本政权更迭后的东亚政策走向	(347)
参考文献	(359)

绪 论

一、本书的研究课题与对象

日本是地处东亚边缘的、西太平洋上的岛国,拥有东亚人的血统与文化。但另一方面,日本自19世纪后期以来就致力于“脱亚入欧”,百年来在国力和心理上与东亚拉开了距离,现今其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其外交奉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路线。21世纪初期,日本依然是中国周边国力最强盛的邻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对象之一、主要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之一,也是在情感上最难处理的一个外交对象。本书的目的,是对截止到2020年这一重要时期的日本东亚政策进行深入探讨,即对其内涵给予全面阐释,对其调整趋势进行科学的前瞻。

对中国而言,到2020年为止的时期,是多重意义上的历史性战略机遇期。

第一,这一时期是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战略机遇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圆满或超额实现了1980—2000年期间使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紧接着,中国又提出了国民经济再翻两番的目标。各种趋势以及指标显示,尽管中国面临诸多困难,但完全有可能圆满或超额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处在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有望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二,这一时期是中国和谐发展明显见效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后,开始越来越注重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效率与公平、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和谐发展。到2020年为止的这一时期,是中国成功克服这几个领域和谐失调现象的关键时期。

第三,这一时期是中国国际环境更趋改善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发展,被国际上一些势力视为“新兴大国的崛起”,他们唯恐其既有国际地位受到挑战,试图从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进行预防性遏制,一有机会就欲给中国的和平发展设置障碍。到2020年为止的时期内,中国必须向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国际上的既得利益集团证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乃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不可能是等来的,而只能是努力争取的结果。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促进和谐世界,就是其基本路径。无独有偶,有迹象表明,中国周边的主要国家,特别是美日两国亦把到2020年的时期视为战略机遇期。但在美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中,不乏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危机感和焦躁感。在他们的言论、文章和政策建言中,经常流露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敌视,

煽动“中国威胁论”，促其政府采取遏制中国的战略。日本的一些政治与知识精英中，也不乏持同样意图和观点的势力，其与美国同行们的区别仅在于，其提倡遏制中国主要不是要靠日本自身的力量，而是要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达到“挟美制华”的目的。

到 2020 年为止的这一时期，无疑也是中日关系的战略机遇期。

首先，中国国力将超过日本。19 世纪末甲午一战，数千年来的“中强日弱”局面宣告结束，“日强中弱”局面出现并持续了百年。日本当时已崛起为经济大国，其以狭小的国土，却拥有远超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进入了腾飞期，与日本的差距开始逐渐缩小。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陷于十年经济萧条期，其后进入低速增长期，而中国则进入新一轮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日经济实力差距缩小进程加速。中国在一系列主要产品的产能和主要商品消费等经济指标上已经赶上或超过日本，在科技和对外投资方面也在奋起直追。到 2020 年，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将超过日本，在经济质量上将进一步缩小与日本的差距，在综合国力上将进一步提升在对日关系上的相对地位。

其次，中日关系将得到新的战略调整。冷战结束后，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进入了结构性调整的新阶段。分析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不能不考虑决定中日关系主要变量的变化。一是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下一个主要潜在对手，开始加大“扶日抑中”，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的力度。日本与之相呼应，采取了“挟美抑华”政策，其对华政策日趋强硬。二是日本政治的变化。随着“革新势力”的衰落，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体保守化”趋势，否认侵略历史、主张摆脱“赎罪意识”和遏制中国崛起的言论和政策不断冲击中日关系。三是中日国力对比的变化。中国国力迅速提升，使中日两国都产生了复杂的心理。经历过长达 2000 年的“中强日弱”、150 年的“日强中弱”力量对比结构后，中日关系正在经受新一轮力量对比变化过程的震荡。其主要表现是，日本执政势力急于在中国更加强大之前强行突破中日关系原有框架，实现其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四是中日舆论环境的变化。随着社会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日媒体和舆论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益加大，使两国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中日关系的转型是国力、战略及心理的调整过程，因此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局面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其主要条件是：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须成功越过“崛起”过程中的内外困难期，日本须结束观望期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多层次上，中美关系须继续走向稳定，朝核问题、台海局势等热点要继续趋向缓和，东亚区域合作应继续得到发展。21 世纪初期，中国国力正在赶超日本，心态日益自信；日本则处在百年优越感崩溃的焦躁感之中。从中长期看，未来的时间对中国

有利。归根结底,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强自身国力和对外影响的能力,将是改变日本对华冷战心态和防范战略、改善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的根本途径。

再次,中日将进一步融入地区合作机制。近年来,随着现实与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日围绕历史、台湾、领土与海域等问题的矛盾与摩擦,在近期内的双边关系范围内将难以得到圆满解决,而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则将中日两国共同融入区域合作之中,从而在多边架构中为缓解双边问题展示了新的途径。目前,“10+3”和“10+6”都仅仅开了个好头,今后的关键就是这些合作机制能否得以深入发展。近年来,在东亚框架之下的区域合作呈现出两种势头并行发展、复杂交错的局面。如以A、B两个代码表述,A进程指以地缘范围划分的两个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即东南亚(东盟)和东北亚(中日韩)各自的对话与合作机制;B进程则指以经济水平划分的两种合作进程的发展,其一是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其二是日本分别与新加坡和韩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近年来,上述A、B两个进程出现了复杂交错的局面。在2001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在未来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步重大突破。仅隔一个月,日本首相便匆匆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中日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上的“巧合”,引发了世人对这两个大国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

随着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发展“雁行模式”的结束和“后雁行模式”时代的到来,世人确实在纷纷议论:在未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谁主沉浮?其实,A、B两类合作进程是东亚两个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合作进程,是基于经济合理性之上的阶段性成果,这两类合作间的相互交错同样是走向东亚区域合作的必经阶段。这两种自由贸易机制的形成,不是东亚区域经济的分裂,而将是东亚最终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步骤和必经阶段。在东亚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下,由哪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都将是难以胜任的。美俄是两个外围国家,自然难以负起主导重任。中日作为东亚两个主要大国,在历史上曾先后在本地区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际环境下,东盟曾以平衡策略发挥了“小国领导大国”的作用,成功主导了东亚经济与安全合作进程。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实力和凝聚力大为削弱,但它对中日任何一方,乃至中日携手主导东亚区域合作依然抱有警惕。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也给任何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大大加深了难度。因此,到2020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主导力量将以东盟为中心,但因时因事将由各国和地区交替或联手登场来担任。然而,中日毕竟是东亚两个大国和潜在的区域经济“双火车头”,如果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达成共识,则将能在这一进程中共同发挥更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日两国就东亚区域合

作形成实质性携手局面之前,东盟对“10+3”框架以及韩国对东北亚合作的推动作用将显得格外突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毕竟只是整个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一个领域,但它也是其十分重要而且最为现实的第一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是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其主要环节包括“自由化”和“制度化”,其具体体现是“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入 21 世纪,中国同东盟决定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谈判,这意味着中国将在 21 世纪“亚洲一体化”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亚洲经济的中心已开始逐渐由日本向中国转移。2009 年 8 月 15 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谈判已经结束。从长远的眼光看,东亚最终要走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区域合作,其实质是走向一个“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如何界定和对待东亚区域合作?这是 21 世纪初中日两国面对的共同课题。目前,中日双方的基本思路,既有共性,也有差异,甚至包括严重分歧。中日能否扩大共识,加强协调与合作,已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本书的撰写思路与方法

对日本而言,到 2020 年的这段时期是一个充满新的机遇和挑战、挑战大于机遇的时期。作为二战后国际体制的受益者和先发达国家或已发达国家,日本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困惑期。日本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围绕这一问题,正如开篇所指出的那样,“21 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这一重大课题着重于对日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其对东亚政策的内容及其调整趋势进行深入探讨。在行文时,将以以下问题作为研究主旨和重点:

第一,21 世纪初期日本东亚政策的总体思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衰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新生代走上政治舞台、政治大国意志膨胀等因素,决定着日本对外战略进入了继明治维新、二战战败时期的两次转型以来的第三次转型时期。在未来新国家战略的选择上,日本出现了“普通国家论”和“民生大国论”两种不同思路之间的战略论战。在东亚政策上,“挟美制亚”、“协美制华”和“入美入亚”、“亲美入亚”两种思路正在进行激烈较量。日本决策层实际上正在和将要选择何种东亚战略?这是本书要予以澄清的第一个重点问题。

第二,21 世纪初期日本东亚政策的布局 and 具体内涵。日本东亚政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日美同盟是核心,居于统领日本的整个东亚政策体系以及安全战略的地位;东亚是日本外交的重点区域,其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领域;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象之一,也是 21 世纪日本既要加以防范和围堵、又必须进行合作和共存的对象;朝鲜半岛和东南亚是日本增强其地区影响,必欲与中国争夺的地区;俄罗斯也日益成为日本欲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在东亚

合作领域,日本欲充分享受地区合作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欲通过掌握东亚合作主导权来确立其政治大国地位,并为未来逐渐摆脱美国的控制准备条件。对日本东亚政策的总体结构和各双边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和充分展示,是本书研究的第二个重点问题。

第三,日本的东亚政策对中国及中日关系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日本实施何种东亚政策,对我国的安全与发展关系重大。本书将在对日本东亚政策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该政策趋向对中国的影响加以评估,就我国因势利导、把握对日关系主动权的问题提出政策思路,这是本书研究的第三个重点问题。

本书在以下问题上力图有所突破:(1)对日本的东亚政策进行总体的深度把握。国内关于未来日本东亚政策走向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还是不足以科学地揭示其发展规律,有待于继续加以深化。例如,围绕日本决策层外交战略调整趋势以及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宪法、日美军事一体化、围堵中国战略、争夺东亚共同体主导权等内外举措的实质、战略意图及其社会背景等,近年来国内研究界正逐步地扩大共识,同时也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模糊认识和不同见解。这种情况已经和继续影响着国家对日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国内舆论的导向。本书力求在把握日本东亚政策的意图、依据、实现条件、调整趋势等方面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2)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的调整趋势进行具体把握。对日本东亚政策的把握,必须以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其对外关系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本书将充分发挥课题组成员具有较深厚研究积蓄的优势,在全面把握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3)对日本东亚政策的走向对中国的影响进行科学把握,从中找出我国对日政策的最佳思路。中日关系的实践和研究,都已到了难以仅就双边关系而论双边关系的阶段。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与整个东亚格局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日本的东亚政策何处去,其实现可能性将有多大,我国应如何加以应对?本书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较为科学、系统的解答,相信能为我国对日政策调整提供基于科学依据的分析。

本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充分发挥主持人和课题组协调与合作的整体优势,以集体的智慧提出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成果。(2)从战略研究的视角出发,把日本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分析与归纳、定性和定量、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双边关系与区域一体化等相辅相成的各方面的已有成果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予以综合和创新,力求在中日关系研究上超越个别领域和单一方法研究带来的局限性。(3)把日本对外战略研究和其双边关系研究相结合,以前者引领后者,以后者论证和丰富前者;把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归宿。(4)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和现代化研究手段,包括通过各类书刊、数据库和互联网搜集资料,制作基础资料数据库,合理运用日本外交研究已

有理论模型并进行创新，对中日两国的有关机构和人员进行采访、调研，举行各种规模的研讨会和中期成果汇报、发布会等。搜集和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最新、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和参考资料。

21 世纪初期日本采取何种东亚政策，对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关系重大。迄今为止，国内外对 21 世纪初期日本东亚政策的研究尚处于分散的、打基础的阶段，尚未出现有深度的综合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本书致力于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日本外交研究的最新进展反映到 21 世纪初期日本东亚政策研究中来；反过来，又将以日本东亚政策研究来论证和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和日本外交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本书致力于在日本外交战略、外交决策、东亚政策及双边政策研究方面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观点和体系。这项研究在日本外交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另外，更具现实意义的是，日本是我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期，其未来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国内研究界也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热烈讨论。本书就 21 世纪初期日本东亚政策提出专项科研成果，以期为国家制定对日政策、正面引导国内的涉日报道和舆论提供科学依据。

第一章 21 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前提

第一节 东亚国际秩序的轨迹与前景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进入了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21 世纪前 20 年,将是东北亚走向新的国际秩序的关键时期。本节拟从探讨这一问题的基本概念入手,就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历史变迁进行历史概观,在此基础上就其未来演变趋势作一展望。

一、国际秩序与东亚国际关系

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国际新秩序问题曾两度上升为国际关系的焦点。20 世纪 60 年代,在政治上纷纷争得了独立而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的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齐声喊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建立何种国际新秩序成为各国制定冷战后战略的焦点。美国急欲建立其心目中的“国际新秩序”,日本踌躇满志地提出了确立“日美欧三极主导世界”的设想。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各种场合反复重申了这一主张。

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的范畴。从全球的视角看,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是人类所处的两种最基本的相互关系形态。前者指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后者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最基本的行为体是国家,此外还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其他各类国际行为体,而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与作用正随着世界的发展而与日俱增。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前者中存在着所有社会关系之上的最高权威——国家和政府,后者则不存在凌驾于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和绝对权威,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然而,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并不能完全自行其是或单方面地任意改变与他国的关系,每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在整体上均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故而国际关系被比拟为国内社会而称作“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

何谓秩序?一种定义是:“(秩序)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①沿用这一定义的话,国际秩序就是各国及其他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

^① 《辞海》第六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第 2459 页。

一定的规则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这一定义显然是把国际秩序作为一种表现或静态来把握的结果。如果从其功能或动态看,国际秩序则指国际关系赖以保持稳定和运行的机制和规则。其中,机制指国际关系中占主流地位的组织形态和运营形式,规则指国际关系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各国间之所以在“无政府状态”下得以维持和遵循国际秩序,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各国间存在着相互制衡的力学关系和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其二,每个时期的国际关系都存在着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规则和通行理念。

国际秩序的外部表现是国际格局或国际体系。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最基本形态有两种:一种是某一超强的霸权国家在各主要国家或势力间充当平衡者的形态即“霸权体系”;另外一种是为各主要国家或势力之间形成某种势力均衡状态的形态即“均势体系”。在这两者之间,曾出现过各种中间状态的国际体系。任何国际关系行为体,既受着国际秩序的制约,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对国际秩序本身的形成和演变产生影响。由于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影响能力强弱有差、价值取向相异,所以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很不相同,其国际秩序中的位置也自然不同。根据其国力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加以区分,人们通常把世界各国划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国家、小国等。归根结底,各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是由其综合国力和政策取向所决定的。就其地位与作用而言,各国分别属于一定国际秩序的制定者、维护者或挑战者。从对本国的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影响而言,各国在一定的国际秩序中或是主要成为受益者,或是主要成为受害者。

国际秩序的形成与演变,首先是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国力竞争和实力对比的结果,只有那些国运强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才能积极主导制定有利于其自身的国际规则,在国际秩序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国际秩序具体包括各方面的内涵,其主要领域有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两者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近代黎明期以来,发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主权国家体系不断向其他地区扩展并终于覆盖了全球,改变和冲毁了各地区的前近代国际秩序。在这一进程中,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少数发达国家居于中心、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沦落边缘的南北型国际经济秩序和以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为基调的国际政治秩序。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兴衰交替一样,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有一个形成、发展和被新秩序替代的演化过程。国际秩序的演变,表现为每一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新旧国际秩序演变的契机和实质,是主要国家间实力对比的质变、国际规则的变迁和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与权力中心的转移。在整个 20 世纪,特别是其后半叶,国际政治秩序经历了西方殖民体系崩溃、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社会主义体制出现、东西方冷战体系形成和瓦解等巨变,国际经济秩序则经受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浪潮的日益强烈的冲击。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上,新旧秩序的交替往往伴随着新旧势力之间的剧烈对抗乃至战争,但最近一次旧秩序的瓦解即美苏两极冷战体系的终结则采取了非战争形式。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向人们展示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变方向:一方面,冷战是以“美胜苏败”的方式告终的,其结果是美国确立全球一极霸权体系的欲望极度膨胀,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另一方面,20 世纪末期国际关系的最主要趋势之一就是一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这一潮流正在冲淡和削弱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垄断地位和主导作用。国际秩序的演变潮流在东北亚也得到了充分反映。一般而言,全球秩序决定着各区域的国际秩序。然而,各区域的国际秩序还受到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缘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因而表现出各自的地区特征和发展阶段。例如,在美苏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却已出现了修正这一秩序的新格局;反过来,在美苏冷战业已结束后,东北亚地区却依然遗留着浓重的冷战气氛。

东北亚,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更是一个地缘政治与经济概念,具体指亚洲东北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各国组成的一个次区域范围;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为其主要当事国,俄罗斯和蒙古为外围当事国,作为全球性超级大国的美国则是这一地区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非地理外围当事国。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北亚国际关系进入了重新定位、重新调整的转型期,这一进程的每一步进展都牵动着有关各方的敏感神经。近年来,各种分析与展望乃至对策建议在各国纷纷问世。随着现实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的视野势必日益克服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进入一个从整体上审视东北亚发展趋势的阶段。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视角,就是从国际秩序的观点思考东北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基于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精神勾勒出 21 世纪东北亚国际秩序的蓝图。当人们着手分析东北亚国际关系之际,其脑际马上会浮现出朝鲜半岛的剑拔弩张、中美日俄的纵横捭阖以及各类东北亚经济合作设想等等一系列具体现象。这些纷繁现象的来龙去脉都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就是存在于这些现象背后的东北亚国际秩序。探讨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演变规律,不能不是把握这一地区未来趋势并对此因势利导的重要前提。

二、东亚国际秩序的四种类型

东亚是世界主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堪与其他任何地区相比肩的悠久的国际关系史,在数千年间形成和发展起了本地区独自的国际关系体系。19 世纪西方势力东渐以来,东亚国际关系的悠久发展进程被强行打断,该地区被强制纳入近现代国际关系网络之中,从而在新的轨道上开始了新的演变进程。从当代国际体系和秩序的观点看,从古至今东亚地区先后出现了三种国际秩序的兴衰交替,21 世纪

初期正在逐渐走向第四种国际秩序。

（一）东亚第一种国际秩序——华夷秩序

在 19 世纪中期西方势力大举东渐之前的漫长古代岁月里，如今称作“东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了以历代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松散的国际体系。当代学者通常把这一体系称为“华夷体系”、“华夷秩序”或“华夏秩序”。这一秩序以中华帝国（“华”）在本地区内无与伦比的强盛国力和文化魅力为基础，以周边各国（“夷”）向历代中国王朝朝贡和接受册封为政治秩序的纽带，以朝贡贸易为经济秩序的保证，其突出特征体现在基于“礼治主义”的等级秩序和强调“德化”、“募化”而非征服和强制的华夷关系，等等。^①

华夷秩序的前近代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其基本的构成单位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第二，其基本性质是一种封建等级制的国际体系；第三，其纽带是德治而不是国际法等法律规则；第四，其经济秩序主要靠“朝贡”这种政治行为而不是贸易得到维系和发展。当 19 世纪中期西方近代国际体系扩展到东方之时，华夷秩序的前近代性、落后性和脆弱性便暴露无遗，以致在西方列强的以先进技术和优越体制为后盾的坚船利炮和工业制品面前迅速走向瓦解。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以往在华夷秩序既是一段历史的辉煌，也是一份沉重的负的遗产。中国在前近代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地区中心地位，在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期曾经成为拒绝和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惰性阻力。随着 20 世纪后半叶中华民族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腾飞，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势力制造出了一系列“妖魔化”中国的理论，极力为“中国威胁论”煽风点火，其中之一就是称中国正在谋求恢复“中华帝国”的昔日辉煌。这种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上述四点前近代性已从社会发展原理上证明了“华夷秩序”的不可恢复性；其次，中国正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加快国际化的步伐。归根结底，只有中国的持续发展和走向世界的事实本身才能最终驳倒“中国威胁论”。就当代中国人而言，则应切忌在经济腾飞势头面前被冲昏头脑，对昔日的华夷秩序存有不切实际的憧憬。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上正轨的 21 世纪，其数千年灿烂文明中的文化底蕴和昔日的辉煌也确实开始发挥正面影响，日益融为中国对外交往中的“软实力”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中国正日益为东亚乃至世界提供巨大市场，并有望为多元共存、共同繁荣的 21 世纪东北亚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增添物质和文化

^① 关于华夷秩序的基本特征参见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日〕信夫清太郎编：《日本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 年，序论第一节“三种国际秩序”；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7—33 页；吴木生主编：《东亚国际关系格局：1894—1945》，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6 页。华夷秩序的经济特征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